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五八期 ——
(二〇〇八年七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7b)

【人物研究】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杨基正·吴精通
【文革一页】	“文革”时期批判《中国画》的闹剧	吴继金
【文革忆往】	“文革”中的溥仪	新风霞
【人物春秋】	“文革”前后的时传祥	谢 涛
【史实澄清】	一件应该澄清的事实	阎长贵
【文革疑案】	“文革”悬案：李立三之死	李思慎·刘之昆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研究】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 杨基正·吴精通 •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

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小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 巧妙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

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比如在刘少奇冤案、贺龙冤案上，他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对这类问题应当怎么看？不仅要看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这个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起由是当年11月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当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联美抗苏战略正在推进。基辛格访华期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苏联打你们，中国需要美国帮什么忙”？这个问题他是不能回答的，必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打起来再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高明的。基辛格回国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再次举行会谈，周恩来措手不及。每一次会谈都要毛泽东同意，会谈内容要毛泽东定下调子。因此马上请示毛泽东，但得到答复是毛泽东已经休息了。周恩来就自己作主再跟基辛格谈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又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打过来，我们军事上怎么合作？周恩来没有重复毛泽东讲的话，而是讲“我们双方各指定一人商谈这个事，现在不要做结论”，这句话同毛泽东的意见稍有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参加会谈的两个年轻人（王海蓉、唐闻生）认为周恩来讲的话违背了毛泽东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说周恩来擅自会谈，还说他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语意非常耐人寻味。

随后，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当时周恩来已经75岁，他在会上讲你们发言讲得太快，我老了记不下来，能否让王海蓉、唐闻生两个人帮助整理记录。江青讲，她们跟主席接近，你是否想利用她们套主席的口风？检查要自己写，不能叫秘书代笔。75岁的老人家还得自己写检查。当时他身患膀胱癌，膀胱不断出血，结成血块，堵住尿道，

每次上卫生间都非常难受，尿排不出来，所以时间较长。江青就讲他利用上厕所回避斗争。这次会议对他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对他身体的打击非常大的。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

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风波。1967年5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那是1932年2月，国民党在报纸上造谣，讲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共。虽然早就弄清是国民党造谣，但周恩来不敢怠慢，因为制造冤案是江青等人的惯用伎俩，造谣污蔑的材料一样可作为他们的证据。这样的事“文革”中太多了。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 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1972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

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等平反，周恩来利用这一契机，推动解放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再如邓小平问题，1972年1月陈毅逝世，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讲：“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些话对邓小平有利，周恩来马上请陈毅的家属把这话传到社会上，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1967年11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再比如毛泽东讲，重点是整走资派，但什么人是走资派？怎么整？他没有讲。周恩来就讲走资派是一定要整，但走资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说的是整不是打倒。还说多数人犯一点错误不算走资派，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说成是走资派。这样使打倒面尽量减少，或者为以后解放留下余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利用“林彪事件”来纠正“文革”错误。“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一些失误，归结于“林彪集团”的严重错误，巧妙加以纠正。如：解放老干部问题，林彪出事后，毛泽东提出对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要平反，周恩来就利用这个契机，争取毛泽东同意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从哪里解放起？从军队解放起。先解放将军，因为军队是林彪管的，将军被打倒可说是林彪造成的，从被林彪直接点名打倒的将军开始，陆续解放175位将军，然后再解放其他人，使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从新走上工作岗位。再比如说抓生产。“文革”当中，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周恩来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全加到林彪头上。林彪事件后，他说，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一定要把破坏性恶果清除掉。这样通过批林来恢复生产，阻力就小得多。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比如讲1959、1960、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采取毛泽东能接受的措施来纠正错误。在纠错过程中，周恩来非常谨慎，言谈举措都让毛泽东能接受，甚至也让江青所接受。1960年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一开始李富春提出方针是整顿、巩固、提高。周恩来一看“整顿”两个字可能刺激毛泽东。就把它划了，改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说明错误程度很严重，而调整就平和得多，这样毛泽东才能接受。再比如解放老干部时，中央发的社论中原来有这么一句话：“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周恩来觉得这样写虽然没错，但会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只讲老干部，那江青一伙怎么想？他们自认为代表的是新干部。于是亲手改成“经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和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改谁都不好讲什么，社论得以通过。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得以顺利落实。

□ 《党史文苑》 2008年第7期

~~~~~

【文革一页】

“文革”时期批判《中国画》的闹剧

• 吴继金 •

“文化大革命”后期，按理说就是在美术界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本很普通的画册——《中国画》，却引起了“四人帮”的高度关注。姚文元亲自发动批判，相关的报刊上口诛笔伐，并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画册？“四人帮”为此大动干戈的目的何在？在美术界到底造成了哪些灾难性的后果？

#### ◇ 《中国画》出版师出有名

“文化大革命”始于文化方面的批判，许多文艺作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在美术领域，先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美术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与“反动”画家的运动，一大批知名的画家被打倒，遭到了政治迫害，很多优秀的美术作品被揭露批判，扣上了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的政治罪名。在这场大规模的文化浩劫中，美术界是重灾区之一。

“文革”时期，尽管群众性的美术活动十分活跃，但仍掩盖不了整个美术界的百花凋零。在出口工艺美术品与对外宣传中国画等方面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对于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促进外交工作和出口创汇等方面都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明确指示要扩大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在宾馆要布置中国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安排。周恩来还特别指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些。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和宾馆布置的需要，国内有关部门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当时的外贸部门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还特地印制了一本出口画样本《中国画》，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中国画》不仅收录了一些知名的国画家当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而且还收录了他们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创作，从今天来看，不能说这些画的质量都是很高的。

#### ◇ 姚文元下令批判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册的批判。在上海市委会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回潮”，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中国画》册里，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在姚文元亲自组织和部署下，“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纷纷粉墨登场。在1974年2月25日上海美术馆的一次会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公开点名批判《中国画》册以及兄弟省市的一些作品，下令“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要进行反击！”并且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册的意见”，借题发挥地攻击说：“《中国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的严重问题。”“在外汇面前……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在第二版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这是批判《中国画》的所谓“重磅炮弹”。3月2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给《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下了这样的黑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嗣后，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批判文章。

《中国画》册被“四人帮”攻击为“毒草画册”，一篇题为《赞香花，除毒草》的批判文章中写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和广大群众唱着相反的调子。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美展，没有一幅好作品’呀；‘工农兵的画政治内容虽好，但艺术水平太差’呀，等等。对美术战线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对工农兵的创作，横加指责。可是，他们对那些散发封、资、修艺术臭气，抒发没落阶级的感情，满纸都是‘野、乱、怪、黑’的所谓作品，却兴致勃勃，十分爱好，满口称赞，甚至捧上了天！最近，我们看到了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首先，我们看看题为《迎春》的那幅吧。作者画了一只翘着尾巴，翻着白眼，张牙舞爪，怒不可遏的好斗的公鸡，站在凌乱、苍白的迎春花下‘迎春’。它要迎的是哪个阶级的‘春’？我们知道，一幅美术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那么《迎春》的作者不正是通过他笔下的公鸡这一特定的艺术形象，来发泄他对社会主义现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之情吗？画公鸡白眼，和强调它的气势汹汹，寓意什么呢？这只公鸡的形象，不是象征一小撮牛鬼蛇神，又象征谁呢？这哪里是什么‘迎春’，分明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阶级，在咒骂社会主义的春天。再看另一幅题为《秋》的作品，又到底画了些什么吧：一堆奇形怪状、不死不活的牛群；一个戴镯持花、蓬头散发、眼神迷离的放牛女娃；在一头伸着懒腰的牛背上停着一对谈情的小鸟。这是哪个时代的秋天？这是哪个阶级的现实？显然作者是用抽象派的手法，用封建士大夫的情调，臆想出来的情节，来百般丑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幅画是1973年作于‘黄浦西岸’的。这是对我们浦江两岸欣欣向荣的、金色般的秋天的歪曲，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无独有偶，在这本毒草画册中，还有一幅题为《山区》的东西，也是画的农村秋景，可是在阴暗漆黑的画面上不见一个人影，几座惨白的房子，好似中世纪的修道院，层层怪山，丛丛的奇树，又黑又冷，阴森可怖。原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 ◇ 殃及整个美术界

一本普通的画册，“四人帮”竟然用来大做文章，在整个美术界掀起了狂风恶浪。他们的究竟何在？其实，批判《中国画》册只不过是其险恶用心的一部分，是其在美术界掀起批“黑画”运动的一枚重型炸弹，其目的是为了在外事部门打开缺口以攻击周恩来，制造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舆论。

其实，在整个“文革”时期，“四人帮”一直用极“左”的眼光看待美术作品。1970年1月20日，姚文元等人“视察”了上海百货一店。姚文元说：“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一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像林凤眠的黑画！”1973年1月26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勃然大怒，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到了1974年初，“四人帮”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在美术界不批林，假批孔，另

搞一套，抓住宾馆画、出口画的问题大做文章，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闹剧，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他们除了在上海首先发动批判《中国画》册外，还于2月15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黑画展”，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江青羽翼下的写作班子以“初澜”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的文章，赤裸裸地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

这场以批判《中国画》册为开端的批“黑画”运动波及全国，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是重点。被认为“黑画”的作品，主要又是那些为北京各大宾馆制作的中国画。黄永玉的《猫头鹰》被列为“黑画展览会”的榜首，被指责为是“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李苦禅画的《残荷图》被加上了“恶毒攻击江青和八个‘样板戏’”的罪名；宗其香画的《虎》硬被说成是“为叛国分子林彪招魂”；李斛的一幅《山峡夜航》由于画面出现的时间是在晚上，自然是在黑压压的气氛中出现有灯光和正在航行的船只，于是也被列入“黑画”的队伍……。为了搜罗“黑画”的行踪，中央美院还派人去上海调查黄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厦画画的情况，并向组织上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黄画了一张国画，在一只鸟的眼圈上有十二个白点，很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当地有人指出这个问题。”“黄在上海专门去找一位老画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画，黄要求要画很多麻雀，这是影射1958年打麻雀运动……”

在上海的批“黑画”运动中，著名漫画家丰子恺首当其冲，有两幅画遭到了批判。《满山红叶女郎樵》的画面是一位勤劳健美的农家姑娘用竹耙在打扫枫树落下来的红叶，画风纯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由于画面上有三片红叶飘然而落，被说成是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毒草。还说什么“红叶代表红色政权，故不可樵”。丰子恺对这种毫无道理的批判不以为然，风趣地说，看来以后再画要改成“满山黄叶女郎樵”了。他的另一幅画《卖花人去路还香》，“造反派”看后造谣说花就是画，这幅画中的卖花姑娘手提空篮往前走，是丰子恺把自己所走过的文艺道路比喻为同花一样香，所以他的“花”能够卖完而退出历史舞台，是自我吹嘘，为自己涂脂抹粉。还说什么那条跟在姑娘身后的小狗是影射共产党，诬蔑共产党，这画是地地道道的反党之作。

除北京、上海外，陕西也是“重灾区”，有20多位画家被扣上了“黑画家”、“反动画家”的帽子。曾担任“美协”西安分会主席的长安画派主将石鲁也遭到了“莫须有”的批判。陕西省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批判“反动画家”石鲁筹备组，还调集西安大专院校几十名政治、文学、历史和美术界的学者批注石鲁“黑画”，搞出了一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一份报送这个批判材料的请示报告中说：“1973年石鲁乘征集国画、书法出口之机，通过西安外贸部门和外贸部门的个别干部，将《猫虎镇宅图》、《文康载道》等一批反动字画相继抛出。这些反动字画中，有的托物寓意，借题发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有的横涂乱抹，用‘野、怪、乱、黑’的画法，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有的狂热地宣扬反动没落的孔孟之道。”在《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中，石鲁作的一幅梅图及题写的咏梅诗（“梅为雪而娇，寒宵更放豪。惟余风漫舞，还看春正高。”）被批注为：“倒梅者，倒霉也。石鲁以此画攻击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并不甘心倒霉，他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傲寒风，‘更放豪’，等待来日‘春正高’，这就是要继续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猫虎镇宅图》被批注道：“石鲁别有用心地在1971年冬将过去的‘猛虎镇宅’改为‘猫虎镇宅’，其罪恶目的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风流千载》被扣上了“无耻地吹捧林彪是芳名流传千载的风流人物。”《富贵于我如浮云，繁华粉色伤精神》被指责为：“石鲁对于文艺黑线赏赐的富贵荣华感恩戴德，现在又借孔老二之口指桑骂槐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新生事物是庸俗的荣华‘富贵’、大‘伤精神’的‘繁华粉色’，其反动立场何等鲜明。”

“四人帮”制造的“批黑画”闹剧，很多美术作品被荒谬地阐述“政治寓意”而扣上种种

罪名，被揭露批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档案春秋》2008年第3期

~~~~~

【文革忆往】

“文革”中的溥仪

• 新风霞 •

编者按：“文革”期间，新风霞与溥仪在全国政协劳改队有过一段一起劳动的生活，新风霞将劳动中值得回味的事记录下来，向世人展示一个特殊年代的相同经历，两个不同人物的共同遭遇。

◇ 皇帝团煤球

“文化大革命”中劳动改造，扫地干杂活，各单位的勤杂工成了造反派了，被审查的所谓“牛鬼蛇神”对象就干勤杂工的各种活了。

团煤球这是很普遍典型的劳改活。我跟皇帝一起用大圆筛子摇过煤球。后来看管人不许摇煤球，让用手团。但摇煤球、团煤球，都必须把煤末子和黄焦泥土照比例掺和在一起，用水和好。用铁铲在当中铲出一个窝窝，放进水再用铁铲搅拌均匀了，水要不多不少团起来合适。

我跟皇帝一起先备料，三分之一是黄土，三分之二是煤末子，我们两人各拿一把大铁铲搅拌，皇帝主动提起大铁桶放水。他干活总是很积极的，可是水倒多了，成了稀糊糊了。皇帝急得搓手，我劝他说：“不要紧，再加些煤末和黄土。”结果足足加了一倍，才能勉强团起来。

干这活需要细心，煤球才团得紧，既不散，也好烧。团煤球和赶饺子皮一样，手上要粘上些煤面子，这才团得圆，又不粘手。皇帝不会干，一双手粘满了煤末子，结成了黑块块，更显得笨拙了。大家不敢松劲，都得按规定一个上午团完。这还不算，唉！最难受的是因干冷冻得手上裂开了很多血口子，团起湿煤，忍受疼痛的味道至今都忘不了。

我们一手团一个，皇帝他两只手团一个，越团越大，比馒头还大，到中午下班时，看管人狠狠地拉住皇帝说：“你看人家团的，再看看你团得这么大，这要多么大的炉子？砸碎了重团！”

大伙干完了下了班，他走不了。他让我回去给他带两个馒头来。我看他真可怜，吃完了饭赶回帮他团。他双手都是煤，也没有洗，就接过我手中的馒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他真饿了。

◇ 皇帝蹬平板车

在劳动改造中，帮厨算是照顾的活，我和皇帝溥仪、沈醉、杜建时一组劳动。在这帮人中，我算强劳力，他们都不太会干活，可是沈醉是湖南人，他说从小就会干活，有经验。

我们在厨房干活，洗菜、刷碗这类活大家都能干，只有皇帝溥仪他不会，我们都帮他。拉菜是较重的活，蹬平板车，要把菜一筐筐装上车。

西红柿上了尖满满一筐，沈醉和杜建时两人搬一筐上车，我和皇帝两人搬一筐上车，皇帝愿意跟我搬，我不大同意跟他一起搬，怕他笨手笨脚搬不动。果然，他还没干就抓头抖手发愁，没有信心，说：“太沉了，太重啊！”

他个子高，蹲下身双手抱住筐用足了力气，我双手抓住筐用力提，可是由于皇帝手劲不够，又狠劲用头顶，不好了，筐一歪，西红柿撒了满地，看管人看见了，狠狠地用力踢了皇帝两脚，又骂：“新凤霞！你干活不用力气！真欠揍！”说着抓起摔在地上的烂西红柿对着皇帝说：“你看看都摔碎了！你吃……”一边说一边向皇帝嘴边塞，搞得皇帝满脸烂柿子，皇帝被推搡着也不动，可两只手不闲着，一个劲地擦抹脸上的柿子泥，搞得一脸。

看管人大喝：“你们还看着？还不快快装车！”

杜建时人虽瘦可他机灵，双手从地上拾起西红柿装进筐。我们大伙都抓起西红柿不住地忙活。

皇帝见看管人走开了，他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刚才被抹了一嘴西红柿，还觉着有点酸甜味儿了……”

杜建时说：“哎呀！你可真是没心没肺，还尝出酸甜味儿了！”

沈醉有力气，我们大伙也都用力把车装好了。平板车上四大筐西红柿，还有土豆、萝卜、葱头。要蹬车送到食堂，这可看技术了。沈醉很积极，他自告奋勇地说：“来吧，我有劲！”

这个大汉要蹬平板车，可是他上了平板车却蹬不起来，皇帝抢着说：“我试试看，因为我会骑自行车。”

我听了替他担心，看他那副骨头架子会蹬平板车？我劝说：“平板车可不是好蹬的，会骑自行车不一定会蹬平板车。我会蹬，只要用力自信使好劲，蹬起来就顺了。”

皇帝逞能地说：“不，我们三个男人怎么能叫你一个女人蹬平板车呀，我来吧！”

皇帝边说边推开我，双手扶住车把就要上车，沈醉、杜建时赶快扶着他迈腿上了车，骑坐很稳当，可是他狠劲躁蹬，车纹丝不动，皇帝用手指指挥我们，大声说：“你们别看着不管，快推！快推……”

沈醉带头用力推，我们三个也用力推，叫着号喊：“一二三！”，不得了，皇帝随着推起来的平板车，用足了力气蹬。车如放了缰绳的野马，正好这是下坡，一下子车飞快地走出好远，我们三个紧追在后边，就听：“咔嚓！”“扑通！”平板车撞到电线杆上了，皇帝倒栽葱，来了个嘴啃泥掉下车来，西红柿、萝卜、土豆等都从筐里翻出来，这可惹了大祸了！食堂等着用菜，怎么办？还好，赶上食堂朴厨师长来了，他热情地去搀扶皇帝，又对我们三个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些菜捡起来还能用。”

对着刚刚扶起的皇帝说：“摔着了吗？”

皇帝双手垂直，摇摇头笑嘻嘻说：“还算好，我没有摔着。因我有骑自行车的功夫，那时骑车天地小，现在骑平板车天地宽了，要不怎么能撞上电线杆子呢？”

沈醉说：“这辆平板车可不简单呀，皇帝溥仪蹬着，当过天津市长的杜建时，当代评剧大家新风霞，还有当过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的沈醉推着，这车威风可不小啊！”

皇帝说：“不要说了，我的嘴破了。”果然，皇帝的手、脸全是血和土！看着他这副样子，叫人眼里含泪笑不出声啊！

◇ 皇帝筛灰

跟皇帝溥仪一起劳动，我很累心，精神稍有疏忽，他就会闹出事来，叫人哭笑不得，但都是他很想把事做好反而办糟了的。

我和皇帝被分配筛石灰，这是轻活；但要找窍门，不然会迷眼，皇帝一看就害怕了。他说：“这石灰迷了眼可不得了，要成了瞎子，那就……”

我劝他说：“不要紧，你只要知道干活的诀窍就不会出事的。第一个诀窍就是看好风向。”

皇帝听了我的话高兴得搓着双手，乐得嘴都有点歪了，他立即积极起来，忙问：“来！怎么干？”

我搬过一米多高的铁沙筛子，用两根木棍把筛子顺着风向支起来。用铁锹铲起石灰向铁筛子甩过去，筛子摆对了，石灰顺着风向筛子后边飞去了。人在筛子这边不会迷眼。我和皇帝两人各拿一把锹，站在铁筛子两边应该一铲一铲地向铁筛子上扔，我把铁锹交到皇帝手中，他狠劲地两只手把住了铁锹把，我说：“你不用两只手攥得那么紧，要随着劲，和唱戏在台上拿刀枪一样不能死把……”我说完做给他看，两只手随着劲铲起石灰甩出去。

皇帝开心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手里拿着铁锹抡起来了。他说：“我小时候在宫里玩过刀枪，那是戏台上用的呀！还画过大花脸哪！哈！想不到呵！今天我真跟唱戏的在一块儿劳动改造了！天上地下呀！这才真是人的生活！那时太反动！现在自由自在呀！那时太不自由了，这么大的北京城，我只能关在那么一个黄圈圈里……”

我和皇帝他一锹我一锹干得很好，只是皇帝用力太大不会用巧劲，累得满头大汗大喘气，不想风向变了，忽然风向我们两个这边刮了，皇帝马上大紧张：“不行啊！哎唷！要迷眼了……”

我说：“不要紧，你带着眼镜呐。来来，咱们把筛子先挪个方向。”皇帝手忙脚乱，我和他两人搬筛子。一阵风刮起石灰，他慌了神，一脚踩进了石灰堆，搞得满腿满身都是灰，皇帝大喊：“不好了！我迷了眼！赶快送医院！我不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说：“不要怕，是沙子。”他说：“是石灰呀！”

我找了一个避风的墙脚，让皇帝蹲下，摘下眼镜。我洗了手，为皇帝翻眼皮，果然大眼皮上有一小黑点，用手绢擦掉了，小黑点出来，他立即轻松了说：“好了，没有事了……”

这时，忽然“啪”一下子有人在我背上用棍子敲了一下，吓一跳，原来是监管人，说：“你们两人可好哇！这些轻的活不好好干，在这儿躲懒，聊起大天儿来了！旧戏子照顾封建皇帝呀！真是一路货色！快起来！干活！”

皇帝和我抢着把铁筛子支好，顺着风向，我们又一锹锹筛起石灰来。皇帝干得很带劲，他

说：“都怪我太笨，迷了眼，多亏不是石灰，是一个小黑沙子。现在我眼好了。看得清楚了！你可为了我挨了一下子，真对不起呀！”

我说：“别提了，算是让狗咬了一口……”我也不敢再说下去了。

皇帝瞪着两只眼说：“真想不到新风霞不单会唱戏，还会治眼翻眼皮！我要告诉我那个学医的，她也得佩服你。”

◇ 皇帝口袋里的两张纸

我和沈醉、溥仪、杜聿明、杜建时在全国政协后院劳动，是对我的照顾，我是中国评剧院派去支援他们劳改队的。我很高兴去，因为这群人都很和气，又都是男人，唯有我是女人，肯定会照顾我。他们也都随便，看管的人也睁一眼，闭一眼，干活时间不多，也不累，休息时也可随便说笑，赶上和气的看管人，还跟我们一起聊天。

沈醉爱说爱笑，也会干活，在一次休息时，沈醉对皇帝溥仪说：“咱们劳动干活，饭吃得多，身体也好，吃饱说说笑笑。啊！老溥，你是咱们这个队里最有名气的人。”

溥仪笑了笑说：“屎壳郎坐上大轮船。”

杜聿明惊奇地问：“什么？”

溥仪说：“臭名远扬了。”

“哈……！”大伙都笑了，这句俏皮话说得多么有意思呀！

皇帝笑得前仰后合，他得意地说：“咱是新人要讲新话了。”

沈醉又逗皇帝说：“皇帝不单平民化，还有了新文化了……”

杜聿明慢条细理地说：“老溥是有新文化，又有平民化，他娶了个平民妻子，又在文化俱乐部北京有名的文化厅结婚的，还去了很多文化人哪……”

文化俱乐部，这个地方是当时北京很有名气的文化人聚会的地方，在以前是欧美同学会的旧址。我当年也是在这里结婚的。

皇帝笑着神秘地从制服口袋里拿出两张纸来，可是又怕大伙看，又有意地躲闪着，双手把纸收进口袋里了，沈醉热情，也痛快，小声说：“嘘……别这么躲躲闪闪，叫看管人看见要遭难哪！”皇帝听了，害怕地从口袋里慢慢拿出来两张纸，原来是他结婚时万枚子送他的诗：

难忘锦闼蒙尘日，末代君王命可知。
岂意十年沾泽后，居然再世脱囊时。
议坛啧啧传佳话，枕边喁喁喜并枝。
寄语西湖贤淑女，交融汉满好扶持。
回忆当年祝大婚，清心涤骨作新人。
倾读密迹相知永，起舞翩跹互爱深。
自有金针期寿考，还将银表共寒温。

新华韵事超今古，红烛高照念党恩。

那时皇帝最大的安慰是有了一个家，因此他把这诗抄写在纸上，带在身边当他的护身符。当时最忌讳纸上写东西，被看管人看见就说是写反动的什么……皇帝拿给我们看，我说：“万枚子先生我认识，他是最热情也最爱写诗的有学问人……”

但为了这两张纸，可真是招了事，监督看管人注意到了，大声叫：“溥仪，你过来！……”

溥仪吓得哆哆嗦嗦连脚步都迈不出去了，看管人狠狠拉他的胳膊，说：“你写的什么反动言论？拿出来！快拿呀！”

皇帝吓得不敢回答，也不敢动，我们在一边觉得这人太老实了，拿出来也没有关系。

看管人问：“你们快揭发溥仪，不许互相包庇，订攻守同盟啊！他写了什么？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见见天日，一定是反动的！为什么他不敢交出来？”

杜聿明、杜建时、沈醉等都没有什么表示，大家都心里明白。这时皇帝翻眼看看沈醉，这下子看管人目标转向沈醉，问：“沈醉，你知道他的纸上写的反动的字！说！快说呀！”

沈醉这人可真是脑子快，他说：“是溥仪结婚的诗，‘回忆当年祝大婚，清心涤骨作新人！’……”一下子大伙都轻松了，看管人相互看看点点头，伸手向皇帝说：“行了，你拿出来，要不拿就是见不得人反动的。”

皇帝从口袋里拿出来交给了看管人。看管人翻过来调过去看看笑笑，扔在皇帝面前说：“你这个封建皇帝还有点人情味呢！”看管人说完就走了。

沈醉说：“老溥，你快拾起来呀！”

皇帝看看不敢动，沈醉帮他拾起替他装进制服口袋，皇帝向沈醉深深鞠躬说：“谢谢沈先生，你真好！”

我们大伙也都笑了。大伙端起各自的碗喝茶，总算没惹出批斗祸来。

皇帝喊我：“下班铃”

跟皇帝溥仪、沈醉、杜聿明、杜建时一道劳动，看管人也不严格，反正都是“死老虎”了，不会出什么错。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戴手表的，我是被单位关进牛棚时就把手表、裤带、钥匙等全部给没收了，干活不戴手表也方便，我养成不看表听上下班铃响的习惯。

天气好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有感觉，心里表很准，太阳到下班时的中午，眼就觉得痛了，我说：“快干吧，要下班了。”果然一会儿下班铃声就“叮铃”响了。下午该下班了，我的眼睛就感到模糊，发胀了。我说：“快了，就要下班了，快干吧。”果然一会儿下班铃又响了，大家各自收拾东西高高兴兴地走了。后来大伙习惯地问：“新风霞，快下班了吧？”给我起了个外号“下班铃”。

一天，皇帝溥仪问：“新风霞你的眼睛很好，怎么能当钟用呢？”他用神秘小声、带有好奇的口吻问。我说：“这是受了关牛棚的罪落下来的毛病，也可说是经验吧。”

皇帝溥仪又问：“关‘牛棚’是怎么回事？多大的‘牛棚’啊？跟牛住在一道？比坐监牢还难受吗？我可在押坐过牢哇，也一转眼过来了……”

我听他说得好轻松啊！我说：“不一样，那是国家监狱，有法律的，犯什么法定什么罪。‘牛棚’是随便关押人无法无天的自制监狱。把我关进一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小屋，也不说为什么关押，一进门先连打带骂给你一顿难受的气受。小屋里只能搭一块木板睡觉，一个小马扎坐着，木板当桌子写所谓‘交代材料’。被反锁在屋里，上厕所大小便叫看管人开开门，时常因为叫门挨打挨骂，说：‘你还想在台上唱戏时叫人伺候着你呀？想出来就出来，不许！’一次，我真的被看管人有意不开门，尿在裤子里，硬是自己渴干了！睡觉只许一面侧身，脸朝窗户，不许关灯，一个大灯泡照在脸上，闭着眼也照得难受，睁开眼更难受。因此，我的两只眼落下了毛病，怕光怕暗，更不敢哭，因为不敢大声哭，只有暗自伤心，偷偷流泪。可是也奇怪了，打我骂我，批我斗我，我从不流泪；只有好心人在无人看见时说句：‘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好日子是你的，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哇……’还有人在看管人不留心时，扔给我一块糖，小会说：‘为了加点热……’这时我就要流眼泪了。我的眼敏感，这是被关牛棚时落下的……”

皇帝溥仪听我说这话，两只眼直直地看着我，他两只手在一起狠狠地搓着，要说什么也说不出，脸憋得通红。他吃力地说：“哎呀……真是比坐监狱还凶狠啊！我这个大战犯，在抚顺坐牢改造时，也没有受过这样的罪呀！1957年12月被特赦时，领导上还把我的衣物和一块金怀表都归还给我了。哎呀！新凤霞你可真受了罪呀！”皇帝边说边摇头叹息着。

我说：“这才是惨无人道哇！我的眼睛也只落个病，也是万幸啊！没有瞎了，真是应当高兴！”

皇帝溥仪同情地说：“我真想不到，太可怕了！怪不得大家叫你‘下班铃’啦。”

◇ 皇帝会作戏了

在和皇帝溥仪一道劳动时，溥仪最不爱听有人说：“咱们是难友……”这类话，他总爱听“新”字，遇见“新”字就喜欢。他说：“你新凤霞就是最好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杜聿明、杜建时就最喜欢说：‘咱们难友们在一起要原谅……’”可是溥仪干什么事都要出点差错，拿东忘西，记性太坏，有时刚放下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可是又有些事，他会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

记得杜聿明对我说：“溥仪虽是岁数不小，社会上的人情世故、生活劳动经验太少了。”

沈醉为人厚道，说：“一个人生下来从刚刚会说话了，就被做了木偶傀儡，他的一行一动就在别人指使下干事，也够可怜的呀！我常常替他做点事，就是同情他的处境，难友嘛，就是要帮助……”

我们在说溥仪，杜聿明认为溥仪不会注意，也不会多心说他，反正溥仪很简单，不怕人说……可是这次皇帝溥仪他真的听见了，他生气地小声嘟嘟囔囔地说：“谁可怜谁呀！还不都是犯过罪的人呀，大家都是各有不幸的道路，不同的遭难。要知道那是在人民面前犯罪就不会干了，我喜欢人家同情帮助，可不喜欢人家可怜我，叫我难友，我是改造好的新人。再说谁可怜谁呀？都是又可怜、又可恨！”

杜聿明看出了溥仪心里有点不大满意了，沈醉用话有意岔开说：“人生道路弯弯曲曲，谁也难以预料自己，从记事就选择一条永远平安享福的道路，可是你溥仪得到新生道路，是被宣布

特赦的第一人，难道这不是最新生最庆幸的事吗？要想想这些……”

沈醉这段话，我听了很新鲜，可是溥仪皇帝又一下子惊喜了，他本来情绪有点低沉，这段话让他激动了，忽地站起来，用双手掸掸坐在台阶上沾的土。这么多人都是坐在地上、台阶上，他这一站起掸灰，个子这么高，大家对他旁若无人地掸灰，都吃了他掸的灰而对他提意见：“唉……老溥、溥仪……别拍灰了！我们脸上都是灰了，你呀，心中就是没有别人……快别掸了。”溥仪这才感觉掸了大伙一身灰，又点头行礼说：“又做了坏事。”

溥仪又重新坐在台阶上，四平八稳，不紧不慢带有节奏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句句实在，字字清楚。他说：“那是1959年……”

杜聿明说：“又是那段，成了祥林嫂诉苦了。”

沈醉说：“你快讲讲你那幸福事。”

溥仪接着说：“那是1959年9月17日后，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皇帝像背戏词一样熟练地一字一句念出来，大伙都笑了。

我是头一次听，心里还真有些感动！溥仪又哆嗦地从口袋里拿出那随身带的小本子，又对我仔细地介绍说：“新风霞，你看看，这是我记下的，一字不错，人不能忘了好呀。特赦那天释放我们的是辽宁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上宣布的。当天被特赦的还有九人，他们是：伪满战犯郭文林、国民党战犯孟昭楹、赵金鹏、周震东、杜聚政、业杰强、唐曦、白玉昆、贺敏。他们也都获得了新生，这个日子是我一生也不能忘的呀！也是我的新生，我把这天当作我的生日了……”

杜聿明说：“看看，这下子又叫老沈把你的话题勾出来了。”

溥仪的眼里又有泪水了。我听溥仪说出他特赦这个日子，心里轰的一下子！因为我虽不是战犯，但也是1959年12月，我也是同样的感受！看见溥仪沉重的情绪，我也难过得两眼潮湿了！杜聿明问：“新风霞，你怎么了？也哭了，替老溥兴奋感动的是吗？为了溥仪的事也伤心了？”

我双手摆着解释说：“不……不，我有亲身体会……”

皇帝说：“怎么，新风霞也是战犯？也是难友？我怎么不知道哇？你怎么是……”

沈醉说：“老溥，你听着，别乱说。”

大家情绪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慢慢冷静下来对大家小声说起我的一段经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西北风吹着树刷刷地响着，看管人也找地方休息去了，我们这伙劳改队的人很轻松地借休息谈心，这是当时很难得的机会，我说：“自1957年我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就成罪人了。”

皇帝问：“怎么划？什么颜色的？向那儿划？”

沈醉同情我说：“过去的事别太伤心，慢慢说，心里痛快……那时我们在押，不知道反右。”又用手势对皇帝摆着说：“老溥别搅闹乱问，听着好不好？”

我看大伙都不能理解，得仔细向他们说：“右派分子什么颜色也没有，只是因为我丈夫吴祖光，他提意见，照说是好心，动员他说是帮助党，多说更好。他真的说了，就成了反革命向党进攻了，给他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右派分子帽子……”

皇帝又不解地问：“是铁帽子还是钢帽子？反正是沉重的。监狱罪犯，戴的手铐、脚镣？是刑法呀？……”

杜聿明说：“别乱说了。”

沈醉说：“是个名称，战犯不也是名称吗？”

我说：“就是个运动中时兴的罪名。”

皇帝仍是不解地问：“你干了什么犯罪的事？”

我说：“我是从小唱戏的，也没有读过书，从来一步两个脚印，不敢做错事，连话都不敢多说，哪敢做错事，哪敢犯罪呀？我看见警察就鞠躬，面前有个电线杆子，我都行礼。”

沈醉、杜聿明等都笑了，唯有皇帝不笑，还在认真地问：“那你怎么也在1959年12月有得到新生的体会？我更不明白了……”

我就进一步回答说：“我丈夫在1957年因提意见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定了反党的罪，逼我和丈夫离婚，我想我们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在文化上、艺术上都帮助我，生活上照顾我，是夫妻也是师徒。他在好的时候是专家，是爱国的名人，我跟他结了婚，现在我也受了冤屈被划成了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了，我要跟他离婚，以后怎么做？会应了那句旧话：‘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了，我把心一横说：‘我是唱戏的，演的尽是贞烈节妇，要是跟祖光这时候离了婚，人家会骂我杨花水性，我不能这样。他改造好了，我们还是一家人！’对方说：‘我们把他送走！’我说：‘送他走，我等他回来！’‘你……你等他多少年？’‘王宝钏等丈夫18年，我等28年！’对方大怒，拍了桌子，我也胆大了，豁出去了，心里坚定了。”

“由于这次对话不顺对方的心，因此我也被判了罪，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帽子。从那天起，我的罪可受多了，一家人骨肉分离，深夜冰天雪地，丈夫被送到远离北京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因为需要我唱戏，台上唱戏，台下劳动改造，观众看戏还没有全部离开剧场时，我这个台上唱主角儿的已经脱了戏装去扫厕所了……从1957年后戴着右派帽子的我，盼啊！盼啊！盼来了1959年，这年12月一天，我也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说我改造得好，那一时刻，我从心里感到轻松，也认为是得到了新生啊！和溥仪当时有共同的感受。”听得出神的皇帝溥仪两眼泪汪汪，他说：“原来是这样，要不咱们怎么成了难友了，难友有共受难的感受，难友真好。”我说：“没有几年，这不是又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吗？我又是个名牌摘帽右派死老虎，痛打！也好，能和你们这些有名的人物一起劳动改造，在我的生活上又丰富了一页呀！”

这时，巡诊的医生过来了，因为医务人员也是属于旧军、警、宪、特、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臭老九之列的人，也大都批斗对象，她们对我们也有同情，也有挨批斗的感受，大都对我们不错。皇帝听到我的这段苦难经过，两眼哭红了，他本来有点牙朝外，这时下意识地张开了一点嘴，流出了口水。听直了眼正发呆，看管人大声说：“干活！你们这些‘牛、鬼、

蛇、神’干什么？开什么反党会议？”

大伙都听着没有动，只有溥仪紧张地站起来了，个子又瘦又高很突出，医生这时走近皇帝，用手摸摸他的头对看管人说：“溥仪他发烧了。”说着用手指着溥仪说：“你跟我来，到医务室拿点药！”

沈醉看皇帝发愣不敢走，说：“你去吧，这些活我替你完成好了，快去吧。”

皇帝竟也变得聪明了！他装着很难过，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地低着头，弯着腰突出了驼背，跟医生走向了医务室。沈醉、杜聿明跟了几步对我说：“溥仪他也学聪明了。”

我说：“这叫随机应变，连皇帝也学会作戏了。”

◇ 皇帝改名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八个样板戏，她接触文艺界人，给人改名是她的最大兴趣。她给当过我们评剧院领导，后调北京京剧院当领导的薛恩厚，改名为薛今厚；给京剧演员钱浩梁改名浩亮；给钢琴家殷承宗改名殷诚忠，还给很多人改名……当时很轰动。

由于“文革”中改名风很盛，改名“革”字是革命意思，改名“武”字是武装意思，改名“争”字是斗争有理意思，改名“翻”字是翻身的意思，改名“造”字是造反的意思。

我们单位有一位唱三花脸的老演员，他叫窦立如，忽然有一天，他胸前贴了一张白纸，写着：从今改名“斗批改”。他从前院走到后院，边走边自我介绍，改名“斗批改”……敲着一面大锣高喊：“革命了！革命了！改名‘斗批改’！”大家互相看，用眼色表示好笑。

过了这阵风，他又照样胸前贴着白纸写着：“改窦立如”。他从前院又走到后院，仍大声自我介绍。后来我们问他为啥改名？他说：“现在是唱戏闹革命，咱就跟着哄！反正大伙都在演戏，咱也跟着过过瘾，起哄！别认真……”

我跟皇帝溥仪一起在全国政协后院劳动，休息聊天，皇帝也偷偷地议论江青，我说：“江青是演员出身，她对文艺界感兴趣，改名是关心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她给谁改名，谁敢不同意，还得说是光荣了，她要给我改名……”

皇帝接着说：“她是有道理的，要新。你已是新风霞，不能改成旧凤霞。”

我说：“给我改成旧凤霞，我也不敢说不好哇。”

皇帝说：“人就是在当权的时候要独断，我也有这种唯我的独裁心理。记得在宫里，有一个小子他姓黄，叫黄立金，听了这个名字，我当时心里就反感，好像他姓黄就不该，他还叫立金，黄和金都应是皇家的，随便一想，我给他改了个名叫黑小三，但不许说姓，只叫‘小三’，因为他在兄弟中行三。现在想想也真太可笑了。”他用手捂着嘴对我说：“江青心里也有一种独裁兴趣。”

我说：“要是封建不倒，你哪能跟我一起劳动改造哇。”

皇帝说：“这是挽救了我，要不我哪里知道这么多知识，又学了这么多能耐呀！”接着，皇

帝又说：“人生一世能够干活，懂得什么是真正人的生活，我得感谢劳动人民，想想前半生，我才真是会吃不会干活的废物了，可怜又可恨！”

□ 摘自《我和溥仪》 新风霞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

## 【人物春秋】

### “文革”前后的时传祥

• 谢 涛 •

劳模，一个充满政治寓意的称号。

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王进喜、陈永贵、张秉贵、向秀丽、郭风莲、王崇伦，等等，数十春秋，这个群体不断壮大。他们之中，有的人成为了国家领导人；有的人曾经辉煌腾达，但是晚节不保；有的人则一直循着自己本来的人生路径默默前行。作为群体，他们的生命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他们的精神凸显着时代的主流价值；作为个体，他们的人生沉浮将历史的戏剧性演绎得淋漓尽致。本文的主人公——时传祥，便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 “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刘少奇的一句话让时传祥家喻户晓

毛泽东时代成就了众多的平民英雄。这些工作于平凡岗位上的人们，解放前曾被视为低贱者，完全为社会所忽视。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塑造一种崭新的社会氛围，歌颂劳动和贫苦阶层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便被政府有意识地挖掘出来。

时传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解放前，掏粪工不仅受到社会歧视，还要受行业内部一些恶势力的压榨和盘剥。时传祥在20年的掏粪生涯中，饱经沧桑。建国后，北京市统一安置了全市的掏粪工，各区成立了清洁队，掏粪工们列入了正式工人编制。同时，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让朴实的时传祥萌生了强烈的报恩心理。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不畏风雨，以群众为先，主动给自己加码，原来每人每天平均背粪50桶，他却背93桶，掏粪的份内事他做，垒好倒塌的厕所这种份外事他也做。时传祥的敬业和奉献精神不仅获取了群众的尊敬，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一个根红苗正的掏粪工，对新社会怀以如此深厚的感情，干出这样突出的成绩，有什么理由不宣传呢？于是，时传祥赢得了众多的荣誉：1954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事迹被报纸广泛报道，他的精神也被浓缩为“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时传祥精神”。

真正让时传祥的名字响彻中华大地，还要归功于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10月26日，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因为所有获邀的劳动者都将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走到时传祥跟前，一把抓住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亲切地说：“你是老时吧？”刘少奇此举让时传祥发了好一阵愣：刘主席怎么就径直走到我面前来了呢？刘少奇的平易近人很快打消了时传祥的顾虑，两人拉起了家常。刘少奇拉着时传祥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老时呀！你当掏粪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

员。这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我们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之后，刘少奇又问起清洁工的学习情况，时传祥自豪地向刘主席汇报：“我这个班又进了新生力量，他们是中学生，如今咱们的掏粪工大部分都能读书看报了，只有我还差一点儿。”听了时传祥的话，刘少奇说：“一个先进生产者，一个劳动模范，光好好工作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接着，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自己使用的英雄100号钢笔，送给了时传祥，并叮嘱他：“年底一定要给我写信。”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合影，而这支英雄100号钢笔，后来便一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

让时传祥想不到的是，与刘少奇的这次交往，竟让他坐上了一辆由天堂通往地狱的人生“过山车”。从那时开始，他和他的家人，所有的荣辱兴衰，都和这位国家主席的政治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 万里曾风趣地对别人说：“我是时传祥的第一大徒弟。”  
向时传祥拜师学背粪竟成了一种时尚

“群英会”以后，时传祥的事迹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尤其是《人民日报》上和刘少奇的那张合影简直让他成了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代表。据报道，北京市曾专门主办了老工人训练班，几千名老师傅悉心倾听了时传祥的报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时传祥事迹展览，参观人数最多达7万多人；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介绍时传祥事迹的小册子——《让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全国发行180万册。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信仰的力量使劳动的美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每个人的心扉。当时，社会上掀起了“背粪热”：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师生，无不以能和老时一起走街串巷背粪为莫大的荣幸，来北京开会的干部，无不以能跟着老时背一次粪桶而深受教育。

1963年6月初，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崔月犁，到崇文区环卫三队“时传祥班”参加劳动。两位副市长轻装简从，公安、环卫、新闻单位等部门的人一个也没带，来到以后，二话没说，抄起工具，便跟着时传祥背粪，直干得满头大汗，两个多小时后才离开。事后，万里风趣地对别人说：“我是时传祥的第一大徒弟。”据说，“文革”中还有人专门整万里，说他劳动后，为了消毒，用紫外线足足照了三天。市长到“时传祥班”参加劳动的消息曝光后，迅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时传祥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大学生、解放军、歌唱演员……，各行各业的人纷纷跑来向时传祥拜师学背粪，最后，连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外宾都来了，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尤马那拉王子还一连来学了一个礼拜。

1964年，时传祥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的国庆节，时传祥作为北京市先进工人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前一天，毛泽东还特意把他接进中南海小住，在宴会上，周恩来专门给他敬酒。

此时的时传祥，仿佛身处天堂，声望达到了顶端。然而，这个完全没有政治嗅觉的朴实工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命运竟奇怪地和国家主席的命运在同一个空间发生了重合，两个月以后，迎接他的将是怎样的一场噩梦？

◇ “时传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工贼，他已被收买。”  
江青一句话，开始了时传祥长达8年的噩梦

1966年12月27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召集北京的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举行座

谈会，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刘志坚、张春桥、穆欣等人出席了座谈会。

在谈到红卫兵组织的情况时，张春桥说：“主席前天（25日）讲：特别反对要很多经费，反对红卫兵要很多经费。实际上人家（刘少奇）容易用钱来收买，红卫兵不需要很多经费。”陈伯达说：“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用捧左派，拿钱收买左派。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可怕的是左派被收买。”江青特别拿时传祥做例子，点名指出：“时传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工贼，他已被收买。”

江青的讲话像一个指向标，此话一出，上海的姚文元立即摇唇鼓舌，大喊：“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霎时间，大帽子、黑棍子一齐压过来，一夜之间，时传祥变成了“千古罪人”。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心领神会，立即指使人来揪斗时传祥。他们来到清洁队，欺骗工人说，要请时传祥去做个报告。清洁队的领导看形势不对，再三拒绝，他们看软的不行，马上变脸：“实话告诉你们，时传祥是工贼，江青已经点了名，今天一定要拉走。”说着，数十人一拥而入，四处搜寻。由于受到工友保护，这次揪斗行动没有成功。12月31日，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政法兵团”趁人不备，冲至清洁队，强行将时传祥绑架押走，在政法学院操场召开了10万余人的批斗大会。他们上纲上线，给时传祥制造了众多子虚乌有的“黑材料”：“时传祥的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时传祥解放前是粪棍”，“解放前时传祥穿长袍马褂，有两辆小车”，等等。这些“黑材料”，作为重要“罪证”，装进了时传祥的档案，真是搞得是非颠倒，有理难辩。从1967年新年开始，时传祥常被押上汽车，脖子上挂着写有“工贼”、“粪霸”字样的大牌子，拉至京城各大街小巷亮相、游斗。

□ 《党史文苑》 2006年第13期

~~~~~

【史实澄清】

一件应该澄清的事实

• 阎长贵 •

1983年5月14日，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中谈到江青的“残忍”时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参观（她认为小靳庄是她的一个代表作），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也是多么残忍！”（《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江青确实非常残忍。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摧残和迫害了数不清的人，很多人被她摧残和迫害致残、致死，但胡乔木把这件事情作为江青残忍的例子和证明却不符合实际。

1974年8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来中国访问时，江青确实陪她去了天津市的小靳庄。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最近向江青当时的汽车司机李子元和护士赵柳恩作了调查和询问，他们说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李子元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有一个很大的车队，北京去了很多车，天津也有很多车。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开的江青的车及其前导车和后卫车绝对没有这件事。至于是否是其他车，如地方的车，撞没撞人，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赵柳恩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我去了，在车上就坐在江青旁边，肯定不是江青的车及其前面和后面的车撞死了人，如有这事我印象一定会很深刻。模模糊糊记得（到小靳庄后听人说）前面有车撞了人，江青等人的车也没怎么停就过去了。她又说，这件事情中央警卫局二处去的人一定清楚，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警卫和保卫工作的。热心和负责的赵柳恩接着又帮我询问了中央警卫局二处的有关同志，继而告我：中央警卫局二处的同志说，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车撞死了一个人，善后工作也是天津的同志做的。

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说为这件事，“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这是没有的事，也是不可能有的事——江青和马科斯夫人乘坐的不是同一辆车。恐怕江青——更别说马科斯夫人了——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文革”中的江青虽然残忍，但对她也要实事求是。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知道胡乔木根据什么材料告诉外国记者“这样一件事”。既然事实不是这样，尽管出自胡乔木之口，也不要再继续以讹传讹了。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5期

~~~~~

### 【文革疑案】

#### “文革”悬案：李立三之死

• 李思慎 • 刘之昆 •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刘少奇等人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不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1930年，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1948年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后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逝世。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审讯李立三，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夫人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根本没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指李思慎）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指李思慎）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不让步。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 摘自李思慎、刘之昆著《李立三之谜》 人民出版社出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